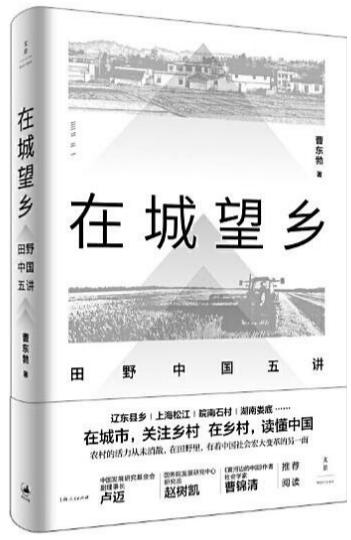


在田野中触摸乡村的脉搏

禾 刀

提示

破解农业农
村发展问题,是关
系中国发展质量
的重要命题。《在
城望乡》从“现状”“历史”“土
地”“治理”与“出路”着眼,抛
开就农村论农村的一元化解
读模式,通过多年实地调研
与学术研究,努力探寻当代
中国城乡格局的变迁与农
村发展问题的现状,试图将城
乡发展统一起来,从而解开城
乡协调发展的密码。在见证
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同时,本书
带领读者认识一个充满活力
的农村,进而真正的田野中
触摸当代中国的脉搏。



“他是地道的城里人,却深度
地卷入到乡村研究领域中。”正是
这样的特殊身份,构成了曹东勃
的研究视角基调。作为一名对农
村问题有着深厚情感的年轻人
学者,曹东勃长期聚焦并致力于农
村发展问题研究,多次带领学生
深入上海市郊、东北等地,开展田
野调查,这让人似乎看到费孝通
的某些遗风。

在《在城望乡》中,曹东勃回
顾了新中国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基
本脉络,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形
成、产业平衡、“三农”问题、粮油
关系、税制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
又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抵近观
察并分析了离乡务农的“农民农”
(外地农民去大城市承包土地继
续当农民)、土地开发、社区治理,
以及家庭农场等农业创新现象。
当然,仅凭一本书试图解答中国
农村所有问题不太现实,但曹东
勃扎实研究学术确实提供了许多
值得深思的线索,对于出身于农
村的笔者来说,在倍感亲切之中
又似乎看到了许多曙光。

曹东勃写到了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
革。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
小岗村十八个红手印掀开了全国
农村土地改革序幕。小岗村的突
破,本质上是农村地权政策的破
茧,即打破了农村耕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间的坚冰。随着承包
制的推广,长期困扰农村的温饱问
题,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渐获解决。

紧随其后的是乡镇企业。乡
镇企业的兴旺曾一度让人看到农
村快速崛起的希望。但这种模式
很快遇到了地区位、基础设施
和产业配套等诸多瓶颈的掣肘,
单纯的低劳动力成本,并不足以
为乡镇企业更高发展提供更为持

久的发展动力。这同时意味着,
走“粗放的工业+农业”混搭模
式不太可能推而广之,毕竟市场总
是逐利而生。

从农村出走,到城市特别是
沿海城市打工,自然成为后来众
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明智选择,
至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数高达
2.9亿。农民工的社会性流动,初
期虽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但最
终还是推动城乡二元户籍政策
的解冻。当个性化利益驱动渗透
到农村的方方面面时,农村人对于
城市生活的向往便不再掩饰。先
富起来的人先是搬到镇上,再到
县城,脱离农村身份和生活是许
多农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所
以,许多农民一旦手头阔绰,便会
像城里人那样盖楼房,模仿城
里人的生活点滴。

事实上,摆在外出务工农民
眼前的除了收入问题,还有另一个
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归属感,
这一矛盾在“农民工二代”身上
表现得尤为突出。与父辈半路
“洗脚进城”不同,他们从小便生
活在城里,除了户籍区别,他们的
日常与城里同龄人并无太大差
别。但在父辈心底,打工终究是
一种临时性的谋生,故乡才是自
己的归宿。

城乡二元户籍破冰,无疑有
助于打破农民工的身份枷锁,至
少有助于“农二代”城市归属感
的建立。作者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农
民增收方面,对农民归属感问题
关注有限,让人略感遗憾。

所有的乡愁都是因为馋。
馋,某种意义上正是过去农村物
资匮乏的写照。

作者聚焦上海城郊外地农
民承包当地农民土地,用于种植瓜
果蔬菜的现象,称这一群体为“农

民农”。与其他务工人员不同,
“农民农”虽然离开家乡,但仍
旧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作。“农
民农”现象本质上是经济梯次发
展的合理写照,不过“农民农”仅
仅局限于城乡接合部,对广大农
村地区发展参照意义有限。

借助机械化实现规模化种
植,这是发达国家农村发展的成
功经验,除了地广人稀的东北平
原等少数地区,我国农村普遍人
均耕地面积少,自然条件和基础
设施均较差,因此,在人口密集地
区,通过机械化的规模种植实
现收入增长的路径并不平坦。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明确将粮食安全作为
底线,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近年来,在城市发展土地供
给需求旺盛前提下,中东部一些
地区开始试行“洗脚上楼”举措。
此举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工业
土地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也给“上
楼”后的农民带来了诸多不便,毕
竟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稳农业就是赋予了一定的地
权,这是中华大地亘古不变的“真
理”。农村土地流转是曹东勃研
究绕不开的话题。土地是中国农
民的命根子,土地流转直面农民
失地风险,所以至今仍只能小心
翼翼地试验。

关于农村发展,曹东勃提到了
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呼
吁企业家下乡。富裕的农村,
大都有一批出色的企业家。2006
年农业税取消后,农村生产压力
得到一定缓解,农民手头虽并不
宽裕,但也不至于出现温饱问
题。如果没有新一轮立足农村、
善于团结更多农民的企业家的出
现,更多人只能寄望于外出务工
实现收入增长。

农村发展不只是单纯的经
济发展问题。曹东勃指出,如果说
中国是个熟人社会,那么在农村
地区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
因为在大多数农村是族系聚居或
姓氏聚居,一个自然村往往是一个
族系或同一姓氏。

曹东勃对重点考察的上海松
江家庭农场给予了足够关注。近
年来,类似松江这样,紧邻大中城
市周边的家庭农场、休闲农场确
实有如雨后春笋,也为当地农村
带来了许多新兴希望。但由于土
地承包期限等问题,急功近利的
投资问题仍旧比较突出。另一方
面,这些投资并非没有前提,那就
是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相对
较好,方便城里人周末游。相较
而言,远离都市的农村受制于距
离,还有交通条件等问题,几无照
搬此类模式的可能性。

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到底向何
处去?这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
题。无论在乡望城还是在城望
乡,这样的换位思考都很重要,不
过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发展
决不能照搬城市发展的工商模
式。曹东勃的研究虽然提供了
有益探索,值得肯定,但同时也
应看到,中国农村地区现状各
异,无论是作物种植还是地理条
件千差万别。

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是政
策红线,也是我们国家粮食自给
自足的底线、社会稳定红线。在
加快城镇化的同时,有必要释放
土地更多红利,让土地利用开发
短线变长线,变一枝独秀为百花
齐放。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或在
于,大力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
这又回到曹东勃前面的话题,就
是变企业家下乡为孵化农民主
业家。

聊书
呼喊与细语
丁春凌

这本书比我想象的小,比估计的沉。
作为老龄社会观察笔记,《莫忘我》行文细致、感
性。作者汤玲玲,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博士,供
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书里的61篇文章,多数是她
对新加坡和日本两个老龄社会群体的深描。

在新加坡超过60岁的老人被称为“乐龄人
士”,汤玲玲笔下的很多高龄老人有着还算不消极
的生活态度,比如年过八十了还爬上梯子去修屋
顶的退休教授,83岁成功申请到博士奖学金的科
学家。这让想起《秋国》的作者杨本芬,一生都不
是半个叛逆者,却在60岁拿起笔,用写作对抗虚无。

老龄社会不得不面对直视的各种沉重话题,
也在书中一一呈现。比如,子女跨国看护老人的
艰辛、失智病人的困窘、独居老人最后的离场……
老去,是每个人滑不过去的章节。汤玲玲的呼
唤与细语里,没有立孝顺或爱的flag,因为,光有
这些远远不够;没有故作勇敢,没有妄图略去老年
时的诸般无助,更没有用优雅的告别去煽情,而是
告诉大家,这一路上,将要面对什么。

谁不曾是、或是将是所爱之人的照护者呢?
对了,看完《莫忘我》,我又买了本《我还记得》,
讲述姐姐仨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的
书,看了看。

还没完。

最后,我还投屏看了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
亲》,是那个“汉尼拔”霍普金斯演的。

写饮食的,通常分两类。一类是教你怎么做
菜,像教程一样;另一类是饮食杂文,食物只作为
一个切入,宕开后,写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情感、
历史、文化等。

周松芳的这本《饮食西游记》就属于第二
类——粤菜在海外的流传。

再会吃,如今谁会知道1900年的菜到底什么
味道?更何况古代的?

在书里,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历史,围绕李
鸿章、梁启超、胡适、赵元任夫妇、朱自清等,在海
外的就餐经历,吃喝喜好等,讲述各界名流和海外
中餐馆的有意思的机缘。

看得我只想吃什么左宗棠鸡、过桥菱鲆鱼、豆
奶冻、橄榄榛子……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收录的是索尔·贝
娄最知名的散文,又精选了他的游记、书评、影评、访
谈、演讲和回忆录等。

有些人对索尔·贝娄不熟悉。他是犹太人,美
国作家,1953年凭借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一
举成名。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中,贝娄写海明威,
写契弗,写他的伊利诺伊游记,泛着淡淡的幽默。
即使在自己最负盛名的时刻,你从他的文字里,也
看不出姿态感。无论写书评、影评,还是现场演
讲,贝娄总是情绪稳定,清醒而不沉陷,道德又不
自得。

对了,契弗是个酒鬼,厉害的是,还活过了70
岁,这个早前我知道,看了贝娄写契弗,我又八卦
到一个细节,契弗还曾经到监狱教囚犯写作。这
简直太有意思了。估计,狱警期待,让囚犯记录自
己的经历,有可能让他们的心灵变得柔软。

书,写得真好,翻译的也简洁优雅。

少滑动一会儿手机吧,毕竟,这世界还有太多
值得思考的事物。贝娄说: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
东西可以依靠也挺好的。它迫使你转向内心,寻
找真正持久的东西。



陶渊明的为父之心

邝海炎

国维全传》

另一个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一般人觉得陶诗闲适,“隐逸
诗人之宗”,给人很仙的感觉。比如,那
首著名的《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
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
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
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见梨与栗。天运苟如此,
且进杯中物。”“且”字多婉妙啊!儿女都
跟“二货”一样,还不如慢慢喝我的酒吧!

可陶渊明真的超脱吗?摇摇摆
摆后,陶渊明作出了辞官归隐的抉
择。后人往往据此赞扬他高风亮节,却忽
略了此决定导致的家庭经济困境,尤其是给
5个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吃饱肚
子,陶渊明有时就向邻居乞讨,“饥来
驱我,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
门拙言辞”,王维批评道,渊明在彭泽令
任上如果能稍稍委屈一下自己,就足以

“安食公田数顷”,何至沦落于斯?《与
魏居士书》所言自属人之常情,并非求
全责备。再看《咏贫士七首》,“一朝辞
吏归,清貧略难堪。年饥感仁妻,泣涕
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看
着哭泣无助的妻子,心意已决的丈夫或
许还可以忍辱负重,可是一旦面对饥寒
交迫的孩子,当父亲的就不能不为此深
感茫然焦虑。这种隐痛在陶渊明晚年
写给孩子们的《与子俨等疏》中表达得
更为直接,“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
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
己,必贻俗患。愧愧辞世,使汝等幼而
饥寒”,父母总想竭尽所能为孩子提
供最好的生活,可猜介的性格令陶渊明无
法与世俗周旋,也让懵懂的孩子平白遭
受牵累。“所以当他回想起孩子们在童
年时所经历的诸多艰辛时,就不由自主地
深切自责……”(杨熹《陶渊明的孩子们》)
这才是最本色的陶渊明,我们不能只

看到他“仙”的一面,还要体味他的“拙”和
“灼”:“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
和冲突。”表面上虽诙谐,骨子里却极沉
痛严肃。”(朱光潜语)

毕竟,把家人当作的人,才有可能
把旁人当作人。陶渊明是否也有类似残
缺呢?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当了
彭泽令后,派了一个仆人回家,帮自己
的儿子干活。去信说:“汝旦夕之费,自
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
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意思是,你自己
干活很辛苦,我派了个劳力给你,帮你
砍柴挑水。但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你
要好好对他。这就是“临人而有父母之
心”(黄庭坚语),陶渊明的人性自然饱满,
健康着咧!

总之,陶渊明是“乐道至苦”,他的
闲适是从忧勤中得来,他的静穆也是从
激烈中得来,是维特根斯坦欣赏的“经
过后努力抗争的单纯和才华”。

唐代都城周边的乡村社会

曲 宏

历史学家把唐朝称为中国的
黄金时代,长安作为唐帝国的首都,
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徐畅在《长安未远:唐
代京畿的乡村社会》里,却没有以都城长安为研究对象,
而是另辟蹊径,将长安周边广袤的乡村,作为“长安学”的
另类作品着重考察。唐代京畿即首都圈里的
乡村居民有怎样的生活样貌?那时的乡村社会是否自由富足?
人们是怎样依附于近在咫尺的都城?这种研究
盛世乡村的新视角,丰富了既有的研究范畴,又将以往
唐朝研究中所遮蔽的盲区呈现出来,让唐朝首都圈
的研究更为“丰满”。

说起唐朝,我们想到的是四
通八达的贸易、雄壮浑厚的唐
诗、鲜艳华美的唐服,而在这繁
华之下,应该还有另一番面貌。
那时乡村的人们是如何在这片
土地上“安顿自己”的?

《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
村社会》聚焦乡村的“日常”,将

了相关研究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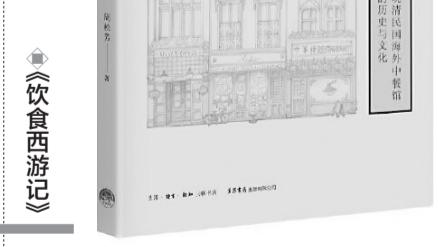
陈寅恪研究史学有一个重
要特点,就是他看历史的聚焦点
始终都是在“人”的身上,他的历
史世界的主角,是中古士大夫,
是活生生的人物、人格,而非事
件、制度、结构。徐畅在考察长
安京畿乡村的历史时,也是以人
为本,其最初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
于京畿地区辅恒的一方墓志。辅
恒祖上曾在隋朝出仕,但他这
一代是农人身份,43岁时因为建
陵义役有功而敕得将仕郎,由农
人的身份转而进入内官行列。这
名农人别样人生都是发生在
唐朝前期的京畿这一特定时空。
这位有代表性的小小人物的
人生历程,成为思考京畿地域社
会特质的样本,也成为京畿乡村
社会史研究方向的发轫。

如果说“长安学”是一门综合
性学科,即通过对长安地理环
境和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复原
历史原貌,深度解读当时的社会
状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与形成的历史,那么,长安京畿
这一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就应是
唐朝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显然,任何都城都不能没
有乡村的支撑。幸运的是,关于
唐朝这一地区的史料相对多一
些,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大量碑
志的出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可
以深入的可能。徐畅在汇集传
统文献、石刻资料、考古文物乃
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关记
载,在零碎而不系统的史料里爬
梳,唐代京畿地区户口统计、行
政层级以及各类阶层人物角
色扮演等方面逐渐规整,无疑填补

季节勤劳农家的劳作场景特别
生动:“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大旱时,
农事的艰难在他的诗中是,“回看归路傍,禾黍尽枯焦”,
于是他叹息“独善诚有计,将何
救旱苗”。这些无不体现当时京
畿乡村生产情况和民生艰难。
而他所处的时代正好是社会
变革萌芽之时,两税法率先在京
畿试行,京畿民众的税收负担沉
重,因此白居易在《赠友五首》中提
及:“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通过白居易的视角,通过
他的讽喻诗,从哪个角度看,对9世
纪的唐朝城乡经济的描述都是
最体贴的了。而透过白居易的眼
睛,徐畅看到的,是唐代京畿乡村
社会史研究的深邃。

怎样把历史资料用活,作者
采用数字技术进行了新尝试。
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无疑要涉猎
更多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这些主
题无法依赖传统的经典和精英
文献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
教授的张广达提出,以往研究唐
代社会缺少对下层的考察,对人
数众多、社会地位较低的平民百
姓着墨甚少。这一情况很多是
由于缺少材料造成的。迄今为
止,界学对于唐代农民家庭的经
济状况究竟是人不敷出,是收支
相抵,还是有所盈余,尚未形成
一致看法。作者在试图描摹乡

《莫忘我》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